

# 试论托尔斯泰的宗教思想

鲁效阳

列夫·托尔斯泰在一篇小说中曾作了这样一个比喻：一群农夫在锄草，一位睿智的长者告诫说，这种耕作法不好，它不能根除杂草，只会使杂草蔓延滋生。可是农夫们不理睬他。果然，杂草蔓延了。后来，一个农夫记起了他的话，便建议大家暂停工作，改变除草的方法。但是，这个农夫的好心被误解，大家视他为反对除草的异端。

托尔斯泰接着说，当他提出福音书上的诫命“勿以暴力抗恶”时，也遭到了同样的曲解：

“当我警告人们说，依照基督的训海，决不可以用暴力去抵抗罪恶。应该用爱去连根带叶消灭它的时候，人们答道：‘我们不愿意听他说的话，他是傻子，他劝我们不要抵抗罪恶，让罪恶来压倒我们。’”

他并指出：

“人的一生不过是一场不断跟罪恶作斗争，用理性和爱来跟罪恶作战的一生，不过在一切的作战方法中，基督摒除那用暴力来跟罪恶作战的不合理方法——这就是以恶抗恶。”<sup>①</sup>

在这里，托尔斯泰对他宗教思想的核心——“勿以暴力抗恶”作了解释，也为他的真理不被人们理解，甚至被曲解而苦恼。托尔斯泰否认自己创立了新的宗教，他认为自己只是重提那久被遗忘的真理而已。他声明，“勿以暴力抗恶”决不是任暴行肆虐，而是要真正根除暴行和罪恶，这方法就是理性和爱。

托尔斯泰一生不倦地探索着，去寻找救世的良方。他想让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农民摆脱沉重的桎梏，也想替自己忏悔的灵魂找寻一个永久的寄托。结果，他在笃信宗教的俄罗斯宗法农民身上看到了希望，从《圣经》福音书的原始基督教义中受到了启示。于是，他便握管作文，宣传他心中的真理，撕掉罩在国家、教会、法律、道德之上的庄严的面纱。

因此，要研究托尔斯泰，就不能不对他的宗教思想作一番认真的探讨。

## 一、托尔斯泰作品中的宗教思想

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始终贯穿着道德和宗教的说教，不论是公开的，还是隐蔽的。在他篇幅浩繁的著作中，人们比较熟悉的是三部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1863—1869)

《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创作这三部书几乎化了他二十二年时间。

在《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揭露了上层贵族的荒淫和无能；同时又通过他的理想人物安德列·包尔康斯基和彼埃尔·别素号夫，宣扬“为上帝而活着”、“爱一切人”的宗教思想。小说中讲到彼埃尔被捕，遭到残忍的法国将军大富审讯时，出现了这样一个奇迹：

“大富抬起头，注意地看了看彼埃尔。他们互相看了几秒钟，而这一看便拯救了彼埃尔。这个注视，越出了一切战争与法律的条件，使两人之间发生了人类的关系。他们两人同时模糊地感觉到无限数量的事物，并且明白了他们两人都是人类的子孙，他们是兄弟”。<sup>②</sup>

这就是“爱”的力量，宗教的力量。

别素号夫在狱中结识了一个善良的、笃信基督的宗法农民普拉东·卡拉塔耶夫。在他身上，别素号夫“觉得那个已经破碎了的世界，又带着新的美，在新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上，在他的灵魂中活动起来了”。<sup>③</sup>

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托尔斯泰则通过安娜的悲剧，无情地撕破了贵族阶级道貌岸然的假面具。但是，对于争取个性自由的安娜，作者又不能原谅她的罪过，因为安娜触犯了他“爱的宗教”。在托尔斯泰看来，对安娜不能宽恕的是她弃家出走，没有尽到作妻子和母亲的神圣责任。“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不过上流社会没有资格向她“报应”，只有上帝才能最后裁决。托尔斯泰让可爱的安娜落得悲惨的命运。而与之相对照，那迷途知返的吉提，终究获得了幸福和爱情。因此，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宗教充当了法官。

无怪乎“有人谈到托尔斯泰的两部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说这好像是上帝拿起他的笔写下的”。<sup>④</sup>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晚年的《复活》。涅赫留多夫诱奸并抛弃了少女卡秋莎·玛丝洛娃，致使她堕入平康。在法庭上，涅赫留多夫却充任了审讯玛丝洛娃的陪审员。这使他天良发现，决定营救她，以赎罪愆。当这种努力失败后，他甚至追随玛丝洛娃去流放地。涅赫留多夫这种诚挚的忏悔终于重新燃起了卡秋莎心里久已熄灭的火，他自己也憬悟到神圣的宗教真理。

“他祷告，求上帝帮助他，到他心中来，洗净他；他所祷告的，其实已经发生了：他身子里面的上帝已经在他的意识里醒来了。他体会到自己跟上帝同在，于是不但感到了自由，生命的蓬勃和快乐，而且感到了善的全部力量。”<sup>⑤</sup>

于是，涅赫留多夫在宗教精神中“复活”了。他最后从福音书的《登山训众》中得到启示，这五条训诫的主旨就是“勿以暴力抗恶”和“爱你的仇敌”。

再看看托尔斯泰自认为写得最好的一篇小说《天网恢恢》吧。这就是《战争与和平》中卡拉塔耶夫逢人即说的那个故事。托尔斯泰在那里把“爱你的仇敌”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商人阿克舍那夫在客栈中被强盗栽赃，后在流放中又遇到了那强盗，并看到他掘地洞以图越狱。但当警方诘问时，阿克舍那夫竟为之掩护。那强盗深为感动，终于天良发现，坦白自首。阿克舍那夫沉冤大白。但当赦令下达时，他已瘐毙狱中。<sup>⑥</sup>

托尔斯泰就是要用“爱”和“宽恕”去感化人们，唤起他们心灵深处的天良。阿克舍那夫在狱中对迫害他的强盗谢苗涅奇说：“上帝会饶恕你的，我可能比你还坏一百倍。”<sup>⑦</sup>他宽恕了盗贼，用生命唤醒了盗贼的天良。

反之，托尔斯泰在另一篇小说《误火焚屋》里，却描绘了不肯宽恕的恶果：两户邻居由于一只鸡蛋引起纠纷，致使其中一人放火，结果两户人家统统被烧成白地。

在这篇小说里托尔斯泰通过农人伊凡之父的话教训道：“……倘若有人来触犯你，饶赦他，像上帝所希望的。那么你的生活变成安静的，你的良心也会常常光明的了。”<sup>⑧</sup>

托尔斯泰认为，只有宗教才能唤醒人们的良心。他在《我的忏悔》中说：“只有当我相信有一位上帝的时候，我才生活着，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我只要想念着上帝，我就生活着；我只要忘记了他，不相信有上帝，我就死去了。”<sup>⑨</sup>

但是，托尔斯泰反对世俗的教会，反对虚伪的、庸俗的和形式化的宗教仪式。他指责那些主教、牧师是“拿了薪俸去宣传一种自己并不相信的伪基督教义，以致阻碍人们去发现那真正的教义”。<sup>⑩</sup>在他的小说《两老人》中，真正达到朝圣目的的不是那个富有的老人，而是在中途倾其川资救人的穷老人。虽然后者因无钱根本没有到达圣地，但那个到达圣地的富老人却确实看到他也朝了圣，而且得到了主赐的福。<sup>⑪</sup>

在《天国在你心中》一文里，托尔斯泰明确地指出：“只要人人开始尽其天职，只要人人开始照着其内心中的良知生活，那末，一切的心灵都在渴望着的天国不久就会来到了。”<sup>⑫</sup>这也就是托尔斯泰救世的药方——人人相爱，人人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善。托尔斯泰认为，这比祈祷、朝圣等俗套的宗教仪式重要得多。

托尔斯泰认为，这是福音书的真谛，随着文明与进步，它被人们抛弃了。因此，托尔斯泰主张绝圣弃智，返归自然。他反对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在他看来，“古时候，人照上帝的法则生活，他们只占有他们自己应得的，而不贪图别人生产的东西”。（《一粒鸡蛋那么大的谷》）<sup>⑬</sup>他又认为，“当我追随着那所谓‘学问之明灯’时，我其实是离开了解决问题的正道”。（《我的忏悔》）<sup>⑭</sup>

综观托尔斯泰的作品，他宗教思想的中心内容就是一个“爱”字：爱自己、爱别人、爱仇敌。一切从“爱”字出发，于是“道德的自我完善”、“勿以暴力抗恶”等救世良方都在宗教的大题目下衍生开来。让我们大家都相亲相爱，这是“主的旨意”。大家都照此办理，一个道德完善的、没有暴力的、永恒宁静的大同世界就出现在你面前，这就是天国。

## 二、托尔斯泰宗教思想的成因

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中说：“宗教，是属于人的本质在自身之中的反映。”“上帝是人的镜子。”他还说：“上帝起源于缺乏感，人缺乏——不管这是特定的，因而有意识的缺乏还是无意识的缺乏——什么，上帝就是什么。”<sup>⑮</sup>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也指出：“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sup>⑯</sup>

俄罗斯民族是一个笃信宗教的民族，托尔斯泰是俄罗斯宗法制农民的代言人，他的宗教思想也正是俄罗斯芸芸众生的宗教思想的代表，是和他们的贫穷困苦以及广大农村的闭塞落后互为因果的。沙皇专制制度是最反动、最野蛮的制度，呻吟在暴政下的人民不得不从宗教中去寻求慰藉和满足。“人们亲见的神……是幸福的信念：即相信神存在着，并且象感情所需要和希望他存在的那样存在着。”<sup>⑰</sup>

当时俄国是一个农奴制国家，生产力低落，宗法式的生产关系被视为天经地义。一八六一年二月，沙皇被迫宣布废除农奴制，但大部分良田仍被地主霸占，而农民须付大量赎金，才能在若干年后得到一小块土地，因此农民仍然不得不依附于地主。同时，在废除农奴制政

策刺激下畸形发展起来的俄国资产阶级却乘机向宗法农民伸出了吮血的吸盘。他们“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sup>⑧</sup>因此，改革后的俄国农民仍每况愈下，他们的反抗情绪也并未平息。根据沙皇政府第三厅的不完全统计，从改革后第二年算起的七年中，发生了一千一百三十一一起较大的农民反抗事件。<sup>⑨</sup>

托尔斯泰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动荡的年代。他虽出身贵族，但自小寄养在姑母家。这使他的性格得以自由发展，且使他能较多地接近农民。在青年时期，他曾一度沉缅于酒色。当时正值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前后，各种资产阶级新思想开始在俄国传播，对他也不无影响。在穷奢极欲之余，他感到了厌倦和空虚，对自己、对周围一切开始从怀疑走向批判。他兴致勃勃地把亨利·乔治关于“凡是土地给予人类的种种利益，所有的人都有同等享受的权利”<sup>⑩</sup>的观点搬到他自己的庄园里进行改革试验。结果，自然是失败了。

托尔斯泰曾在不长的一段时期里对西方文明抱过些若明若昧的希望。但出国考察以后这种希望破灭了。当他第二次出国得知俄国废除农奴制的消息时，他的态度是冷漠的，因为他知道，取而代之的并不是他理想中的社会，而是同样该被诅咒的资本主义。

当时，“共产主义的幽灵”已在欧洲徘徊，但宗法农民的意识限制了他，他竟把目光由先进的西方转向落后的东方。他研究过佛教和伊斯兰教的经典，还翻译过老子的《道德经》。他用东方的哲学充实了他的基督教义。但是不管怎么说，托尔斯泰的宗教仍然没有离开东正教的范畴。在各种宗教中，他认为基督教是最理想的宗教。在他的一篇小说里，托尔斯泰让各种信徒云集一堂，却让基督徒在辩论中战胜了其他各色教徒。托尔斯泰写道：“每一个人都想有一个他自己的特殊的上帝，或至少一个他本土的上帝。每一个民族都希望把世界所无法包容的东西限制在自己的庙宇里。”然而，“有哪一种庙宇能和上帝亲自建造的用以连接一切人于一种信仰和一种宗教的庙宇相比拟呢？”<sup>⑪</sup>

托尔斯泰“扬弃”了各种宗教教义，同时也撷取了它们的精华以补充《圣经》福音书，以致人们把他的宗教思想称作“托尔斯泰主义”——一种净化过的、“真正”的、或有人称之为“新的”宗教的思想。

然而，托尔斯泰反对那种说他创造了新宗教的讲法。他声称：他不过是在阐述基督教的真正教义而已。因为千百年来它被“正统”的教会歪曲得不成样子，福音书上的浅显真理和诫命正不可容忍地被人们忽略和曲解着，因此他主动承担了信徒约翰的使命：解释福音书的真谛并将它传授给群众。他把那些蓄意曲解基督教义的人和正教教会，看作真正的恶魔，予以深刻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每一种异教能从教会及教条的向前发展中看到的只是变质与堕落；正因为是这种情形，所以市民异教也要求恢复原始基督教的简单教会制度，要求取消独霸的僧侣等级。”<sup>⑫</sup>

千百年来经验已使教会意识到任何个人对福音书的解释所包含的危险性。它知道，谁要使其生活完全符合《圣经》中的文字，那他势必会跟教会的正式标准和国家的法律发生冲突。<sup>⑬</sup>他们视托尔斯泰为危险的异端，宗教大会开除了他的教籍，他的学生被逮捕，流放；他本人也受到沙皇警察的监视。然而，托尔斯泰并没有屈服，他努力去实践自己的宗教理想：他自己耕种田地，不再吃肉，不再打猎，决定放弃财产和著作的版权。最后，八十二岁高龄的托尔斯泰悄然出走，中途病故在一个小火车站上。

托尔斯泰的一生就是不倦地探索宗教真理、自认为发现了宗教真理和顽强地宣传宗教真理的一生。他忏悔自己过去的行为，用宗教精神“净化”自己，以图达到良心的平静。他渊

博的学识和孜孜不倦追求真理的认真态度，使他敢于向沙皇和教会制度这些庞然大物挑战。

恩格斯曾经说过，基督教“在其产生时也是一种被压迫者的运动：它最初是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sup>②</sup>正因为如此，后世反对正统教会的异端几乎都是以解释原始教义为其号召被压迫下层人民的主要手段，来反对世俗教会的。从公元四世纪迦太基的多纳特派到十二世纪初意大利的阿尔诺德异端，以及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无不主张恢复原始基督教的性质，无不指责现世的教会违背了福音书的训示。托尔斯泰对教会的指责，就其本质来说，并没有超过历代的宗教改革者。

### 三、宗教思想在托尔斯泰作品中的作用

一八五〇年，初入文坛的托尔斯泰在谈到艺术作品时曾讲过：“所有的作品想成为好的，都应当如果戈理谈到自己的俄国故事时（《她唱出了我的心怀》）所说的，要表达出作者的思想。”<sup>③</sup>这就是托尔斯泰创作的准则。

的确，在托尔斯泰思想的每一发展阶段，我们都可以在他的作品里找到相应的影子。

早期，他留恋恬静的宗法制庄园生活，幻想替苦难的俄罗斯农奴寻找幸福的伊甸园。于是，在《童年·少年·青年》和《一个地主的早晨》中，托尔斯泰描绘了自己的理想，并替主人公伊尔琴耶夫和涅赫留多夫涂上了卢梭和亨利·乔治的思想色彩；中年的托尔斯泰踌躇、徘徊，于是列文便苦恼、彷徨，甚至想自杀；之后，作者心中的天国终于被发现，他就让涅赫留多夫复活了。正如高尔基所说的：“……涅赫留多夫、列文、伊尔琴耶夫、奥列宁——所有这些人都是作者自己的肖像，所有这些人都是他精神发展上的几个阶段罢了。”<sup>④</sup>

托尔斯泰在后期坚定地认为现代艺术的基础是宗教意识：“基督教的艺术，即现代的艺术，应该是普遍的，换言之，应该是世界性的，因此它应该联合所有的人。”“艺术的使命是把‘人类的幸福在于相互团结’这一真理从理性的范畴转移到感性的范畴，并且把目前的暴力的统治代之以上帝的统治……”<sup>⑤</sup>

不管这种看法正确与否，托尔斯泰自己确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特别是到了晚年，他的宗教思想最后系统化时，托尔斯泰更是有意识地为宣传他的宗教教义而去创作。我们研究托尔斯泰，不能回避这一事实，不能不顾及他的宗教思想在他作品中的重大作用。

可是，多年来苏联的某些研究者恰恰避开了这个美杜莎的头颅，在他们篇幅浩繁的论文中，喋喋不休的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者”、“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俄罗斯民族的骄傲”，而对于托尔斯泰的宗教思想，以及它对其作品的影响，则很少有人认真地加以探讨。

要正确地认识托尔斯泰的宗教思想与他作品的关系，我们不能不回顾一下当时的历史情况和列宁的评价。

一九八〇年托尔斯泰八十寿辰前后，沙皇的御用学者们为了消弭托尔斯泰的巨大影响，大肆鼓噪，在俄国文坛掀起了一阵名为赞颂，实则歪曲托尔斯泰思想的浪潮。他们蓄意夸大和着重渲染了托尔斯泰思想中的消极因素，企图以这种被他们宣传过甚的思想去麻醉正在觉醒中的俄罗斯人民，为风雨飘摇的沙皇制度加添一根支柱。

在这种情况下，列宁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对托尔斯泰作了一系列分析。列宁认为，托尔斯泰“一方面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下了一切假面具；另一方面，鼓吹世界上最讨厌的东西之一，即宗教，力求让有道德信念的僧侣代替有官职的僧侣，

这就是说，培养一种最精巧的因而是特别恶劣的僧侣主义。”<sup>⑧</sup>

在这里，列宁强调了托尔斯泰的宗教思想对革命的消极作用，指出了它之所以会被反动的沙皇所利用，正是由于它本身的弱点所致。事实上，任何宗教，不管它的倡导者的本意如何善良，终究是麻醉人民斗志的精神鸦片。

但与此同时，列宁也充分地估价了托尔斯泰，不止一次地赞誉他“是俄国革命的镜子”，“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

不少研究者片面地理解了列宁对托尔斯泰所作的客观分析。他们想当然地得出结论：托尔斯泰的宗教思想既然是“一种最精巧的因而是特别恶劣的僧侣主义”，那么，体现在他作品中的宗教思想当然完全是这些作品的糟粕部分了，因此，宗教思想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自然没有地位可言。这么一来，这个恰恰对托尔斯泰创作起重大作用的因素被一笔勾销了。

我们不否认，宗教思想对托尔斯泰的创作产生了许多消极的东西。除了它对作品主题起了不良的影响之外，即使是那种冗长的说教，不近情理的，甚至近乎雷同的宗教故事也使人味同嚼蜡，难以卒读。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托尔斯泰对宗教福音的认真的、穷根究底的探索，也正是他创作的动力之一。他以他的宗教准绳去衡量一切，凡是被认为亵渎了神圣的原始基督教教义的东西，他都给以毫不留情的抨击。他的那种企图发见“拯救人类新药方”的仁爱精神和作为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对人民的巨大同情，在他的思想中有其一致的地方。他从这种精神出发来攻击暴虐的沙皇政权，攻击沙皇卵翼下充当专制制度辩护士的伪善的教会，攻击构筑俄罗斯人间炼狱的道德和法。在进行这一切的批判时，托尔斯泰自己根本没有想到，他是在替革命打扫奥吉亚斯的牛圈，而他敏锐过人的洞察力使这种批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的穷根究底的顽强精神使他击中了沙皇专制制度的阿基里斯之踵。不管是否出于他的意愿，他客观上为俄国革命建立了彪炳日月的功勋。托尔斯泰的影响超出了俄罗斯的国界，不仅因为他是一个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还因为他是一个思想家。

但是，托尔斯泰的宗教学说是“可笑的”，就其本质来说，是反动的。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这里反动的一词，是就这个词的最正确最深刻的含义用的”<sup>⑨</sup>，也是从当时的政治历史条件出发来说的。因为，托尔斯泰的思想始终没有超出宗法农民的思想，“托尔斯泰的思想是我国农民起义的弱点和缺陷的一面镜子，是宗法式农村的软弱和‘善于经营的农夫’迟钝胆小的反映。”

因此可以说：托尔斯泰的宗教思想所表现的东西正是他对沙皇专制制度的“热烈的憎恨”和“对于恶的无抵抗”的混合物。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他抨击和反抗的余音，不是号召农民起来与罪恶制度作斗争的鼓动，而是软弱无力的宗教说教，和在幻想中求得矛盾解决的企图。以他一九〇八年发表的猛烈抨击沙皇专制的政论文《我不能沉默》为例，他一方面痛心疾首于二十多个无辜农民的被绞死，强烈抗议沙皇政权的残暴行为；另一方面，他又呼吁农民忍耐宽容，并请求沙皇和斯托雷平改弦更张。

托尔斯泰作品中的理想人物是普拉东·卡拉塔耶夫、阿克舍那夫和阿福杰也夫（托尔斯泰的遗作《哈吉·穆拉特》中的人物），他们都是些笃信宗教的俄罗斯下层人民。托尔斯泰了解他们，同情他们，关怀他们。在他们身上倾注了他全部的爱。但是，他无法改变他们可悲的命运。他们的命运反映了宗法农民理想的幻灭，也是托尔斯泰宗教理想的幻灭。

的确，托尔斯泰对人生的探索是失败了。但是，在这种顽强的探索精神主导下，他“不仅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sup>⑩</sup>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

(1) 托尔斯泰的宗教思想贯穿于他作品的始终。研究托尔斯泰，不能避开他的宗教思想来谈世界观和现实主义的矛盾，正是他虔诚的宗教思想引导他忏悔自己和他出身的那个阶级的行为，使他接近宗法农民，而成为他们的代言人，而这又反过来愈益坚定了他的宗教观。

(2) 托尔斯泰生长的时代是俄国社会关系急剧变化的时代，是宗法农民面临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双重压榨而极度贫困化的时代。宗法农民思想的剧变，也反映到托尔斯泰的作品中。托尔斯泰一生就是想为他们寻找人间的伊甸园——小国寡民、清欲无为的宗法制庄园。因此，他既反对沙皇和教会，也反对“文明”和“进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托尔斯泰的天国是乌托邦，托尔斯泰的理想是幻想，托尔斯泰的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托尔斯泰的一生因此永远陷于无法解脱的现实和理想的矛盾之中。

(3) 因此，探索托尔斯泰的创作道路，应该恰如其分地估计宗教思想在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托尔斯泰创作中所起的作用，而大可不必讳莫如深，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理解托尔斯泰，拨开罩在托尔斯泰研究上的迷雾。

注：

① 托尔斯泰：《三譬喻》，转引自史丹芬。褚威格《托尔斯泰的思想》第106、107页。文化出版社1951年版。

② 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1365页。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

③ 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162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④ C. P. Snow: 《The Realists—Portraits of Eight Novelists》 p. 139, MacMillan London Limited 1978.

⑥⑦⑧⑩⑬⑭ From 《Twenty-three Tales by Lee Tolstoy》 Translated by Aylmer Maud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⑤ 托尔斯泰：《复活》，第15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⑨⑩⑫⑬⑭⑮ 均转引自褚威格：《托尔斯泰的思想》。

⑮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92、103页。三联书店1962年版。

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⑰ 普列汉诺夫：《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俄译本所写的序言和注释》之注释5。

⑱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3页。

⑲ 参见《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1825年—1905年的俄国》部分，商务印书馆。

⑳ 转引自《欧洲近代文学思潮简编》第279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30年版。

㉑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2页。

㉒ 恩格斯：《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25页。

㉓ 阿·波波夫金：《托尔斯泰传》第62—63页。辛守魁译，黑龙江出版社（即出）。

㉔ 高尔基：《俄国文学史》第48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㉕ 托尔斯泰：《艺术论》第20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㉖⑳ 列宁：《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列宁全集》第15卷第179页。

㉗ 列宁：《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列宁全集》第17卷第35页。

㉘ 列宁：《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列宁全集》第15卷第181页。